
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

茅海建

厦门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之一,1840—1841年的三次厦门之战,也是鸦片战争中的几次重要战斗。然而,史学界对于厦门之战仍缺乏系统的研究,许多史学著作叙及于此,亦有一些史实错误。笔者拟从军事学的角度,考察这些战例,并分析攻防双方的优劣。不当之外,仍祈同行们予以批评。

一、第一次战斗

第一次厦门之战发生于1840年7月3日,是鸦片战争的初战。

对于这次战斗,不少史学著作称,英军由广东北上,遣军舰5艘攻厦门,由于闽浙总督邓廷桢加强了厦门的防御,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攻,英军见厦门不能得手,遂北上舟山肆虐。

这种说法自有其依据,其一是《道光洋艘征抚记》,该书对此战有以下叙述:

是月洋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五艘攻福建厦门……总督邓廷桢督金、厦兵备道刘耀春(椿)炮中其大兵船火药舱,沉之。又募水勇数百,伪装商船,出洋攻之于南澳港。是夜无风,洋艘不便驶避,且舵尾无炮,我舟低,又外蔽皮幕,统弹不能中,遂坏其舵尾,掷火罐喷筒,歼其夷兵数十。会风起,夷船始窜遁。

其二是《中西纪事》，该书谓：

时调任闽浙总督邓廷桢侦知英师将取道窥厦门，预募水勇在洋巡缉，乘其不备而攻之……（英军）先后过者仍驶厦门，遣人递书以求通贸易，为请制府，不答。先后调派水勇师船迎击于厦门口外，不克，遂乘夜将各师船收回港内，复载大炮二百余门，轰击英人入口之船，连败之。英师既遁，仍乘舟北驶，行至浙洋，侦舟山无备，遂入焉。

这两段记述，虽对战斗经过的描写有着不小的差别，但结论是一致的。厦门清军在邓廷桢的统率下，获取了该战的胜利。由于这两本著作在当时和后来都有不小的影响，他们的论述也被当作史实来引述。

然而，上述说法，与当时的历史史实并不相符。

要弄清第一次厦门之战的史实，有必要先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厦门清军战前有无加强防御的措施，有多少兵力参战；二是来厦英军的数量和目的。

先看看第一个问题。

各种清方文献都已证明，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王朝内部无人预见到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清政府也根本未作任何战争准备。林则徐领导下的广东地区，虽有一些防卫建设，但用意仅在防备英军小规模骚扰。如虎门炮台建设，起始于1835年，完工于1839年，并非为这次战争而兴工，实际上是对1834年律劳卑来华时的虎门之战的战后补救防卫措施；又如九龙尖沙咀炮台建设，乃是林则徐用以防备泊于虎门口外的英国两艘军舰和一些鸦片武装走私船。邓廷桢任职广东期间，也没有任何对后来战争的警报^①。

1841年1月，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4月至福建任所。邓廷桢的这一次调动，是由于广东严禁鸦片后福建沿海禁烟地位日显重要，更是由于御史杜彥士上奏弹劾福建水师交战不力致使鸦片走

^① 参见拙文《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私猖獗。很显然，道光帝的用意在于加强福建的禁烟。于是，邓廷桢赴任后，整饬福建海防，竭力禁绝猖狂一时的鸦片武装走私活动。从邓廷桢到闽后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以振奋福建清军查禁鸦片的斗志；又由于以往鸦片走私船窜入厦门较少，他也根本未下令在厦门加强防御，反是命令该处文武官员率领驻防厦门的水师战船前往他处缉拿鸦片走私船。从邓廷桢等人的奏折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福建海防的整顿，主要是对水师严行纪律，防止勾结；以水师战船进行海上巡逻缉私，其重点地区是泉州府所属的晋江、惠安等县，并在该地区多次与英国等国的武装走私船交战^①。

由此，可以说，至1840年7月3日第一次厦门之战时，厦门清军仅是以低于平时状态的兵力兵器投入战斗的，并无充分的战前准备，更谈不上加强防御的各项措施了。

然而，厦门清军的平时状态又是如何，又能有多少兵力兵器投入战斗呢？

厦门是清王朝疆域内的海防重地，清朝第一支大型海上武装力量——福建水师，其提督就驻在厦门。鸦片战争之前，厦门一带清军有福建水师五营，额设官兵4300余人，额设大横洋船、同安梭船、桨船共67艘，额设大小各类火炮400余位，鸟枪2377杆^②。从此兵力兵器的数量来看，厦门清军较他处为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若从近代战争的角度来看，厦门的防御力量又很薄弱。首先，兵力驻扎分散，指挥体系混乱。厦门清军中约有2000人是在

^① 邓廷桢等人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284至285页，第288至290页，第295至296页，第308至310页，第312至314页，第341页。

^② 周凯等：《厦门志》，卷三《兵制》，卷四《海防》。其中火炮有以下品种：行营炮（50位），大中小铁炮（214位），百子炮（112位），子母炮（50位）。除火器外，另配有冷兵器弓箭（1023副），腰刀大刀（403口）。

陆地驻防的，其中在厦门岛外围的同安、马巷、龙溪、海澄等县、厅分设汛地 41 处，每处派兵 5 名至 200 名不等，共计约 1400 名。驻防岛上的清军共计约 500 余名，分守汛地 10 处、堆拨 24 处及炮台、城门等处，每处少则 1 人，多则 50 人^①。这些分散驻防的清军，平时主要是执行警察的职能，即弹压民众，临时难以集结应战。其次，战船完好率低，样式远远落后于英国。厦门清军中有 2000 余人是在战船上任职充差的，共有大横洋集字号船 5 艘，成字号船 5 艘，一、二、三等同安梭船 38 艘，桨船 19 艘^②。大横洋船、同安船为战船，桨船是内海巡哨之船。大横洋船虽为清军水师最大之船，但与英军相比，差别霄壤。邓廷桢称：

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底船旁，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内地师船……以集、成字号为极大，然皆不敌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为之，惟桅柁木较坚致。船之大者，配炮不过八门，重不过两千斤。若再加多，则船身吃重，恐其震损……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③

邓廷桢的话，是将其在广东任上所见英舰与福建水师最大师船相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而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开来的最大军舰，更超过了邓廷桢在广东所见的英舰，这样实力相差也就更大了。然而，厦门清军战船 48 艘，仅是理论上的数字。据祁雋藻等人的奏折，鸦片战争前夕，福建全省额设战船 242 艘，进厂兴修未竣、届修未能进厂、工期拖延未完工者达 91 艘，遭风击碎尚未补造者达 33 艘，实际在营驾驶者仅 118 艘，战船完好率仅 48.8%^④。厦门的情况也不例外，据邓廷桢的奏折，战船能出海者约 20 艘^⑤。再次，炮台规

① 《厦门志》，卷三《兵制》。

② 《厦门志》，卷五《船政》。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375 页。

④ 祁雋藻等奏，《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辑》，第 314 至 316 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342 页。

模小,无力应战。厦门一带共有炮台6处,其中在厦门岛上有3处,分别为岛南岸的厦门炮台,驻兵25名,岛东岸的黄厝炮台,驻兵仅1名,岛西北岸的高崎炮台,驻兵30名^①。这些炮台的样式大小,火炮的数量质量,笔者尚未查到有关资料,但据祁嵩藻等人的奏折,闽省“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②,由此可以推测厦门一带的炮台状况。

从厦门清军的平时状态可以推测,至1840年7月3日第一次厦门之战时,由于水师战船均出洋巡缉,可以应战者,仅是岛上数百名守军,由于英舰入侵路线为南航道,可以对敌者,仅有一处小炮台即厦门炮台。以这样的兵力兵器作战,自然是十分不利的。

另外,还需说明的是,一支在兵力兵器上在清王朝疆域内均属上乘的清军,出现如此的状况,也是有其原因的。厦门清军长期以来的作战对象是海上反清势力和海盗,因此,集中兵力专守一处,难以对付他们乘虚蹈隙、小股窜犯的作战样式,更何况兵力的分散驻扎,会有利于及时镇压民众的反抗;战舰本是为“捕盗缉私而设”^③,自然不需要大舰巨艘;炮台的目的是在扼要之处防范海盗的窜犯,当可简陋设置,因为分散且弱小的海盗根本没有攻坚能力。厦门清军的平时任务与即将遇到的近代化战争相比,两者之间正有着巨大的落差。

再看看第二个问题,即来厦门的英舰究竟有多少?是否为攻厦门而来,是否因不能克厦门而去?

这里可以看看英国侵略军抵华后的行踪。

1840年6月21日,由印度开来的英国远征军抵达广东珠江口外。次日晚,驻印舰队司令伯麦少将率舰队北上,直趋舟山^④。这支舰队共有战舰5艘,武装轮船2艘,运输船10艘。6月30日,该

① 《厦门志》,卷三《兵制》,卷四《防海》。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291页。

③ 祁嵩藻等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64页。

④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9卷,第107页。

舰队抵达舟山群岛的南端^①，7月2日，进入舟山定海的道头港。7月5日，该舰队进攻定海，至6日，陷定海县城。

1840年6月28日，由英国及开普敦开来的英国远征军部份舰船抵达珠江口外，6月30日，全权代表、远征军总司令懿律与全权代表义律率舰队北上^②。第二批北上舰队共有军舰4艘，武装轮船1艘，运输船4艘。7月6日，也就是定海之战次日，该舰队才到达舟山海域，根本没有参加战斗。

前往厦门的英军军舰，是第二批北上舰队所派出的。7月2日上午，当懿律率领舰队经过厦门时，根据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训令，派出军舰“布朗底”号(Blonde)前往厦门，向当地官员送交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③。而懿律所率领的舰队在厦门根本没有停留，直接北上。“布朗底”号舰长胞诘受领任务后，当日驶入厦门南水道，7月3日，胞诘率舰北上，于7日左右到达舟山海域。

从这一行程来看，来厦门的英舰与攻占定海的英军舰队毫无关系，称英军在厦门不能得手遂北上舟山肆虐的说法，很可能仅是从7月3日第一次厦门之战、7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的时间顺序上，来推断其中的逻辑关系的。这一行程还说明，来厦门的英舰只有1艘，决不可能有5艘之多，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英军舰队还没有5艘军舰。

实际上，邓廷桢在第一次厦门之战之后的奏折，也证明了英舰的数量和任务，谓：

六月初四日(即7月2日)，有英夷兵船一只，由清屿洋闯入屿仔尾海面。……该船悬挂白旗，并无动静……初五日，夷船开放杉板船一只，内载三十余人，冲过对岸，船头一人，口操官音，称欲求和，语多狂悖。该文武等(指驻守

① 伊里布奏，《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1册，近代史所藏。

② 《中国丛报》，第9卷，第112页。

③ 罗伯聃报告，见《中国丛报》第9卷，第222页。

厦门官员)并力斥阻,不许上岸。该兵船换挂红旗,声言开炮……^①

英方称送交文件,邓奏称“欲求和”,虽有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艘军舰来厦门的目的决不是进攻厦门。此后,道光帝又派祁寯藻等人去调查,他们的报告与邓奏完全相同^②。

综合以上两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次厦门之战是在清军完全没有准备,英军只派出一艘军舰前往递交文件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些前提条件也决定了,第一次厦门之战只不过是一次小规模军事冲突,而不是一次真正的攻防战斗。而在确定了这些前提条件之后,我们又可以十分清楚判明战斗的经过了。

英舰“布朗底”号是英国海军的一艘风帆动力的五级军舰,载炮44门,拥有舰员200余人。该舰奉到命令后,于7月2日中午,驶入厦门南水道,在距离厦门岛南岸的厦门炮台大约1海里处下锚。根据英方的报告,大约一小时后,一艘悬挂“厦防厅巡船”红旗的小船驶来,内有一名广东行商、一名清方官员和五、六名水手,诘问英舰的来意。英方翻译官罗伯聃简要说明了他们递交文件的任务,解释了白旗是休战的标志,并向他们递交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英军欲求见当地军政长官,以转交巴麦尊的公文副本,并说明了白旗的作用。一小时后,另一名清方官员又来,将该信退回。下午三时,罗伯聃与一名英军军官驾小船前往厦门岛,为岸上清军所拒,不得已而返回“布朗底”号。据罗伯聃的观察,此时厦门炮台虽可安设5门火炮,但一门也未架设,岸上清军有军官6人,士兵二、三百名^③。然而,英方所述的这些细节,不见于清方材料,邓廷桢的奏折虽提到“悬挂白旗”,但称英舰“并无动静”。

此时,驻守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兴泉永道刘耀椿正率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40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509至510页。

③ 《中国丛报》,第9卷,第222至224页。

领水师战船在泉州一带巡逻缉私,在厦主持事务的只是署厦防同知蔡观龙、护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陈胜远。他们一面催促提督、道员回厦,一面“安设兵勇炮械,准备攻击”^①。同安县知县胡国荣闻讯赶赴厦门,同安营参将魏廷寅亦调兵 200 名待命,准备应援^②。

7 月 3 日清晨,“布朗底”号起锚,逼近厦门岛,因无风,至 11 时方在距岸 500 码处下锚,以使递交公文的行动能在舰炮的射程范围内进行。据英军的观察,清军也在积极准备,炮台上已架设了火炮,另建有安炮 3 门的临时炮兵阵地,一些战船也从内港中拖出,准备参战。

此后发生的战事,邓廷桢的奏折与罗伯聃的报告,互有差异,但大体情节还是可以对起来的。

据罗伯聃的报告,中午之后,罗伯聃率 5 名未带武装的随从(邓奏称 30 余人),打着白旗驾小船前往厦门岛递交公文。清军仍如昨日布阵,阻止罗伯聃的行动。当小船抵岸边约五、六码时,罗伯聃即以中文告以来意,此即邓奏中“欲求和”的由来。由此看来,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厦门清军始终未明白送交公文的目的。据邓廷桢的奏折,开战的起因是,英“兵船(“布朗底”号)换挂红旗,声言开炮”,于是清军抢先向罗伯聃等人开枪、射箭。而罗伯聃称,当其小船距岸仅两码时,清军冲上来企图抓住他,小船随即后退,清军射箭、开枪。远处的“布朗底”号舰长胞诂见此,立即以舰炮轰击岛上清军,并轰击清军水师战船。邓奏称清军“哨船及岸上弁兵,枪炮联络,中伤夷人多寡不能藉记”;而据罗伯聃的报告,清军炮台及战船上的火炮似乎没有轰击。并称,当其回到“布朗底”号后,用中文写了一份告示,由一名英军军官带领两只武装划艇,企图上岸贴在炮台的墙上,由于清军的抵抗,胞诂为防止无谓牺牲,命该部英军撤回,将该告示装入一只小瓶,抛入水中,见被一人拾起。至下午 4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340 页。

② 同安营参将魏廷寅禀,《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 1 册。

时，“布朗底”号起锚，北去舟山。据邓廷桢的奏折，第二次小船行动是在战斗刚开始就进行的，只有一只小船，载10余人，企图“前来帮护”罗伯聃等人。他们“直扑炮台，经护参将陈胜元手执长矛，刺中白夷一人身死”。并称，英军遭受挫败后，“各该杉板船始行驶傍大船，转帆窜逸”。对于装告示的小瓶，该折没有提及。至于交战的结果，罗伯聃称，大败清军，击毙清军约10至12人，其余清军溃散，英军无一伤亡。邓奏称，击毙英军4人，伤甚众，清军战死9人，伤14人，“炮台兵房击破数处，滨海民房亦间有震损”^①。

虽然双方关于战斗的细节差别较大，但细心核查双方的报告，可以看出，英军在战斗中处于优势，占据上风。具体地分析某方在战斗中的某一细节上属真属伪，在今天说来，既无必要，又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结论：在这次小规模军事冲突中，清军损失更大；不能将这次战斗称为清军获得击退英军进攻的胜利。

至于前引《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西纪事》所提到的海上交战，清官方文献和英方记录中均未提到，很可能是该书作者将前一段时期的福建水师与鸦片武装走私船的交战，同第一次厦门之战搞混了。

二、邓廷桢的筹防措施与第二次战斗

1840年7月7日，即厦门之战后的第四天，邓廷桢接到厦门开战的报告，立即由福州起程，赶赴泉州。7月11日，抵达兴化府。

① 罗伯聃报告，见《中国丛报》，第9卷，第222至228页。邓廷桢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40至341页，但邓非为亲历者，他是据刘耀椿的报告而上奏的，而刘耀椿亦非亲历者，他是根据当时在厦文武官员的报告而报的。邓奏中的英军伤亡人数恐非事实。他上奏称英军有三人被击毙于开战之初，其中第一个被击毙的是“能作官音夷人”，即罗伯聃。而据罗伯聃报告，他的小船后撤时，因摇晃而失去平衡跌倒，恰巧一箭射来，险些送命，并称清军枪弹在船上水手的头部旁边穿过。可能当时厦门清军误以为射中罗伯聃，击中英军2名而去报功。此外，祁离灏等人的奏折记叙亦详，内容同邓奏，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562至563页。

得到兴泉永道刘耀椿的详细报告,知道战事的经过。但是,他此时尚不知道英国已派侵略军来华,鸦片战争已经开始,仍然认为:此是“卖烟夷船”的举动;并命令,出洋巡缉的厦门水师战船 20 艘分成两帮,提督陈阶平率 10 艘“留守厦门”,在港口堵御,另外 10 艘仍在晋江一带巡逻缉私。为弥补厦门水陆兵力之不足,又命厦门同知雇佣民船 5 艘,“交营配驾,协力巡防”,命同安营参将魏廷寅带领前已集结的兵丁 200 名,前往厦门,“建筑炮墩,协力防守”^①。7 月 17 日,邓廷桢方知上次前往厦门的不是“贩烟夷船”而是英国“兵船一只”。18 日,又得到浙江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的报告,英军舰队 20 余艘进逼定海,局势危急。邓立即意识到,中英局势大变,战争已经开始。他分析了福建海防的特点,认为厦门是“闽洋紧要之区”,“连日会同水陆提臣并兴泉永道,督饬厅营,添备炮火,加意周防,以杜其复来滋扰”^②。

由此可见,自 1840 年 7 月 18 日起,即第一次厦门之战的 15 天之后,厦门才在邓廷桢等人的督率下,进入了全面加强防御的阶段。

邓廷桢等人的筹防措施为:一、建造炮墩。由于福建沿海炮台较小,建造大型炮台尚需时日,即以建造炮墩应急。炮墩是用麻袋装填沙土堆积而成的临时性的炮兵工事,高由 5 层麻袋至 10 余层不等,厚则最少 5 层,周长从 10 余丈至 100 余丈不等^③。陈阶平、刘耀椿根据厦门岛的形势,认为厦门南水道是英军进犯的主要途径,遂在厦门岛南岸、鼓浪屿、海澄县屿仔尾(与厦门岛南岸遥相对应,相隔约 4 公里)大力建造炮墩。在这些炮墩上共安设火炮 268 位。二、调拨兵将。除已调同安营兵 200 名外,邓廷桢另调漳州镇、延平协、兴化协兵 600 名,驻防厦门岛南岸,使厦门岛南岸一带的清

① 邓廷桢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341 至 342 页。

② 邓廷桢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347 至 348 页。

③ 据祁离藻奏和邓廷桢的信,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292 页;《鸦片战争》第 2 册,第 587 页。

军守兵达 1650 名。三、雇募勇丁。为弥补兵力不足,邓廷桢在厦门一带雇募乡勇、水勇共计 1300 名,分防各地,配合清军^①。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清军设防的基本特点:一、防御的主要区域为厦门南水道,而其中的重点又在厦门岛南岸,从后来发生的战事来看,布防区域和重点是选择得当的。二、由于邓廷桢认识到福建水师根本无力与英海军在海上交锋,预定的作战样式,也从前期的巡洋缉私与鸦片武装走私船交战的方式,改成依托海岸预设防御工事、以师船配合岸炮进行防御作战。经过以上筹防措施,厦门岛的防御力量有所增强。

就在邓廷桢的筹防措施基本落实之际,1840 年 8 月,第二次厦门之战爆发了。

关于第二次战斗,清方的主要记载是邓廷桢和祁高藻等人的两份奏折。根据邓、祁的报告,8 月 21 日,英三桅船、二桅船各 1 艘,在厦门外围岛链青屿以外游弋。8 月 22 日,英船悬挂红旗,直扑厦门岛南岸,清军师船迎战,南岸火炮亦开火夹击,叠中英舰,其中击中英舰之火药舱一次,击中其舵尾多次,击沉其舢板船一只,英舰不支而退出战斗,仍留在青屿之内。清军此日战死 6 人。23 日,英舰船再次逼近厦门岛南岸,清军当即回击,打中英舰多次,将其帆索烧毁,鼓浪屿一带清军亦开炮轰击。英舰见各处均发炮,不能冲过,遂再次退出战斗。该日清军战死 1 人。24 日,英舰船派舢板船 3 只,追赶入口之中国商船,清方水勇驾划龙船 4 艘相救,将英舢板船逼至屿仔尾后的小湾内,击中英军 5 人,救出被追商船,水勇受伤 2 人。25 日,英舰船仍逗留未去,清军昼夜巡防。26 日,英舰船起锚,扬帆而去,留有书信一封,交渔船带回^②。一些论著,根据邓、祁的奏折,称厦门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攻,取得了第二次厦门之战的胜利。

① 邓廷桢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1 册,第 448 至 449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 448 至 451 页;第二册,第 580 页。

英方关于第二次厦门之战的记载亦很少。如《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仅有两次简单地提到此事：一次称自“布郎底”号事件后，“鳄鱼”号(Alligator)和其它舰船封锁厦门港，有效阻止了当地的通商贸易；一次说自“布郎底”号事件后不久，“鳄鱼”号也给予了类似的打击^①。其它英方著作基本未提此事。而《中国丛报》1840年9月号转载了《广州纪事报》(Canton Press)的一封私人短信，谈及此事，摘译如下：

厦门的满大人们最近遇到自己的对手，即“鳄鱼”号及支援它的‘布里玛’号(Braemar)。一位“鳄鱼”号上的上尉在“里拉”号的甲板上，描绘了他们出色地炮击师船，并干净利落地从师船中间穿过，直扑海岸的效果。他们击沉了16或17艘师船，而自己的舰船却没有受到相应的损坏，无一人战死，甲板上也没有人受伤。当中国人发现其师船经受不住这些舰船的炮火时，一夜之间，他们在通往内港的水道前建起了工事(breastwork)，并架设了204门火炮，其中一些是重炮。由于舰船上缺乏足够的兵力以强行登陆，只得退出火炮的射程之外，许多炮弹打中了舰船，其中一些是18磅重的炮弹。战舰(指“鳄鱼”号)主桅上的武器被打掉，还有一发炮弹打进舰壳，依然留在那儿。他们还在通往内港的该岛南岸，建造了一座炮台，正积极地进行防御的准备，我想这些舰船已经北上，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又据伍德罗称，“伯兰汉”(Blenheim)号将开往厦门，进行封锁……^②

这封信的作者并非亲历者，所言也是道听途说之事。但是，从这段记录中，我们又可印证许多：一、邓廷桢等人奏折中所称三桅船，当

① W. B. Bernard ;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Nemesis", 1844, Vol. 1, p. 235, Vol. I. p. 120.

② 《中国丛报》，第九卷，第326至327页。

是“鳄鱼”号，二桅船当是“布里玛”号，前者是载炮 28 门的五级军舰，后者是英国侵略军的武装运输船。二、“鳄鱼”号、“布里玛”号执行的应是封港任务。三、在交战中，清军水师战船不堪一击，因而在邓廷桢等人奏折中谈及第二天（即 23 日）的战事时，只提炮台，不提师船。四、邓廷桢等人筹建的炮墩等防御工事，在战斗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当然，英方所称“一夜之间”非为事实。

如果我们将英方的这些材料与清方材料相对照，可以看出，关于作战经过出入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没有提到起因。我们可从战事发生的时间上进行分析。8 月下旬，英国侵华舰队的主力正在大沽口外，准备与清政府进行谈判，侵华陆军的主力正驻在舟山，还有一些军舰正根据巴麦尊的训令，在珠江口、厦门港、宁波港、长江口执行封锁的任务，企图用切断海上贸易的方法来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这种情形下，英军不可能下令攻取厦门。从“鳄鱼”号等舰船执行的任务来看，从邓廷桢奏折中所提到英舰派舢板追逐入口的中国商船的线索来看，此战很可能是由封港而引起的战斗。因此，笔者以为，此战前期英舰船对清师船时，英军似占了上风，而后期英舰船对清岸炮时，又似清军占了上风，但不管战斗的经过如何，结果对谁有利，它毕竟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攻防战斗，这表现为英军的进攻目的并不明确。如果将此次战斗称为厦门清军击退了英军第二次进攻，立论似不稳妥。

三、颜伯焘的筹防措施

1840 年 9 月，道光帝以“办理不善”为由，将邓廷桢撤职，交部议处，另调云南巡抚颜伯焘为闽浙总督。颜氏接旨后，进京请训，尔后转道江浙，迟至 1841 年 2 月，方抵达福州任所。他分析了福建海防的形势，并据前两次战斗的经验，决计亲自驻守厦门，督办防务。3 月 2 日，颜伯焘抵达厦门，查勘地形，部署防守各措施。于是，在颜伯焘、刘耀椿及新任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的督率下，厦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防御建设。其主要措施为：

一、继续加强厦门南水道的防御。颜伯焘等人根据前两次战斗英军皆从南水道突入的经验，积极改善厦门岛南岸、鼓浪屿、海澄县屿仔尾三个重点地区的防御工事。

厦门岛南岸是最重要的地区，原设临时性工事炮墩经过数月后，“沙囊久则腐散”，不再坚固，则将之改造为“石壁”。石壁是用花岗岩大石砌成的线式炮兵阵地，高1丈，厚8尺，全长500丈，每5丈留一炮洞，共安设大炮100位。为防止英军舰炮击中石壁飞起石块伤及守军，在石壁的外侧，护以泥土，以柔克刚。石壁之后，建以兵房，供守军栖居。在石壁的侧后，再建以围墙，以作为防护。这样，石壁成为厦门岛南岸的永久性的核心炮兵阵地。除此之外，在石壁以东地区和以西地区，另建有炮台多座，安炮共62位。

在厦门岛西南的鼓浪屿岛，清军亦兴建了几座炮台，安设大炮76位，以利用鼓浪屿居厦门南水道之中的地形，正面迎击来犯英舰，遮护厦门岛侧翼的安全。

在厦门南水道南侧、与厦门岛遥相对应的屿仔尾，清军亦兴建、扩建了工事，设炮41位，以配合厦门岛南岸的守军，夹击来犯英舰。

由此，在厦门南水道的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三处，共安设火炮279位，部置守军2799人，并形成了封锁南水道的三点交叉火力，增强了防御的整体效应^①。

二、在厦门岛的东、北两个方向设防。

1841年1月7日的沙角之战，英军从沙角炮台背后的穿鼻登陆，抄袭后路，致使沙角炮台失陷。颜伯焘根据此战的教训，在厦门岛的北岸、东岸数处要点，部署防兵1410名，设置火炮100门，准备与登陆部队交战，掩护厦门岛南岸的主阵地。

为了防止英军以小船从厦门北水道绕行攻击厦门西水道（即

^① 颜伯焘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80页。其各处火炮安设数量又参据英方记载。

厦门内港),以致造成厦门市面的混乱和影响南岸主阵地的安全,颜伯焘还在厦门岛西北角的高崎一带,派出哨船 10 艘,兵 300 名,以护卫厦门西水道^①。

三、在厦门南水道外围岛链设防。

1841 年 4 月,颜伯焘已大体完成厦门的防御设施,又根据前两次战斗的经过,决定在厦门南水道的外围岛链设防,以形成厦门防御的第一道门户。

外围岛链即浯屿、青屿、小担、大担诸岛,它们像一串链条,散布在厦门南水道的海口,颜伯焘决定在此建造“石堡”,即石筑炮台,并移驻清军一营,分守各岛石堡。由于外围岛链相距较远,难以配合作战,颜伯焘决定兴造大型战船,协同设防各岛作战。他对此的作战预案是,若英军舰队在从外海闯入厦门南水道,在经过外围岛链时,“各岛开炮轰击,则大船亦开炮迎击,小船分驶焚攻”,从外围就击退来犯之敌,确保厦门的安全。至第三次厦门之战前,清军已完成了各岛上的“石堡”等工事,建造大型战船及置办商船共 50 艘,但“石堡”和战船所需火炮达 1300 位,尚未铸成。结果,只是“空台空船”,在第三次厦门之战时未起任何作用^②。

通过以上措施,颜伯焘在厦门一带共安设火炮数百位,部署清军 5680 名;他为了保证清军未重点设防地区的安全,还雇募水勇、练勇共 9274 名,以配合清军,各保地方。

如果我们将颜伯焘等人所规划、主持的厦门防务建设,与战前平时状况即第一次厦门之战时相比,简直差别霄壤;就是与邓廷桢的筹防措施相比,也就是与第二次厦门之战相比,也是大大提高。厦门防务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度。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一些,将此时的厦门防务与清王朝其它海防要地相比,可以认定,厦门的防御工事最坚固(主要是石壁),所设火炮为第二位(仅次于虎门),

^① 颜伯焘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 册,第 880 页。

^② 颜伯焘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2 册,第 980 页,第 1153 页。

所调兵力(不包括“勇”)占第二位(仅次于吴淞、宝山),是清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邓廷桢、颜伯焘、刘耀椿等人积一年多之艰苦努力,竭尽了他们的最大能力、权力和智力,动用帑银近百万两,才达到此成就。为此,颜伯焘对未来战斗的结局充满信心,在其奏折中得意洋洋地宣称:

臣履勘厦门,前后左右,处处设兵安炮,尚属周密,各将士志切同仇,无不发奋自励。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帆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①

颜伯焘这种自信的态度,恰恰说明了他对于近代战争的无知,对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无知。对于这一点,笔者拟在下面进行专门的分析。

四、第三次战斗

第三次战斗发生于1841年8月26日。这时鸦片战争的局势已经大变。

就英方而言,1841年5月,英国政府否定《穿鼻草约》,改派璞鼎查来华,扩大侵略。8月11日,璞鼎查到达澳门,决计引兵北上,先行攻占厦门。8月21日,英舰队离开香港。这支舰队共有军舰10艘,载炮共310门;武装轮船4艘,共载炮16门;运输船22艘,载运陆军共计约2500人^②。

就清方来说,1841年5月广州之战失败后,靖逆将军奕山谎报战况,讳败言胜。不久,他又谎称广东“洋务大定”,奏请撤退原调援广州的外省军队。道光帝为其蒙混,以为战事即将结束,于是下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80至881页。

② 《中国丛报》,第10卷,第524页。各舰火炮数量为:“威厘士厘”号(Wellesley),72门,“伯兰汉”号,72门,“都鲁壹”号(Druide),炮44门,“布朗底”号,炮44门,“摩底士底”号(Modeste),炮18门,“卑拉底士”号(Pylades),炮18门,“巡洋”号(Crriser)炮16门,“哥伦拜恩”号(Columbine),炮16门,“班廷克”号(Bentink),炮10门,“阿尔吉林”号(Algerin),炮10门。轮船是“西索斯梯斯”号(Secostris)、“弗莱吉森”号(Phlegethon)“复仇神”号(Nemesis)、“皇后”号(Queen)。

令各省撤防,以节省军费。颜伯焘确认奕山称谎,并据广东按察使致福建布政使的信件,上奏弹劾奕山;但为了应付严旨,也不得不有所动作。他遣散了一部份水勇乡勇。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也因“盗踪未灭”,乘此“广东议抚”之机,率部份战船出洋巡缉。但是,由于颜伯焘坚持定见,不为所动,整个厦门防务,“未敢遽议裁撤”^①。

根据中英双方的文献^②,参照核对,第三次厦门之战的经过如下:

1840年8月25日傍晚,英舰队到达厦门口外,在已有入港经验的“布朗底”号舰长胞诘的引导下,舰队当晚穿过外围岛链。浯屿等外围各岛的清军虽向英舰开了几炮,但因炮台多未安装大炮,火力不足,又无师船在海面上配合作战,颜伯焘的第一重门户拦截交战预案无法实施。英军舰队当晚顺利地驶入厦门南水道。颜伯焘此时因窦振彪出海未归,急调金门镇总兵江继芸来厦门协同防守。

8月26日清晨,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驾、陆军司令郭富,乘轮船侦察厦门防务,并立即制定了进攻计划:以“布朗底”号等3舰进攻鼓浪屿岛,掩护陆军步兵3个连、炮兵1个连及海军陆战人员170名从侧翼登陆,攻占该岛;以“威厘士厘”号等6舰及轮船2艘进攻厦门岛南岸,炮击守军,其余轮船及小船在舰炮的掩护下,运送陆军各团登陆,攻占厦门。与此同时,颜伯焘派商人驾小船前往英舰船锚泊水域,诘问来意。英军交付一份由璞鼎查、巴驾、郭富联合签署的致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的最后通牒:“将厦门城邑炮台,让给英国军士,暂为据守。则所有将弁官兵,均准带兵械安去

① 颜伯焘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1093至1095页,第1151页。

② 中方文献为:颜伯焘奏,怡良奏,端华奏,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1151至1154页,第3册,第1485至1486页,第1183至1184页,第1568至1572页。林树梅文、徐继畲函,见《鸦片战争在闽台资料选编》,第144至148页。英方文献为:《英军攻占厦门的报告》,郭富致印度总督阿克兰、巴驾致印度总督阿克兰、胞诘致巴驾、爱利斯致胞诘,见《中国丛报》,第11卷,第148至157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伯纳德:《夏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奥塞隆尼:《对华战争记》,穆瑞:《在华战役记》,麦克法森:《在华两年记》,汉译可见《鸦片战争在闽台资料选编》。

……贵提督果能照此办行，则各炮台城上插竖白旗为号可也。”^①颜伯焘对此不予理睬，加紧各处的战前准备。

26日下午1时15分，港内起风，英军各舰船起锚扯帆开动，按其计划，驶向指定的攻击位置。颜伯焘坐镇厦门岛，指挥厦门南水道的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开炮，“三面兜击”来犯英军。英舰队以轮船“西索斯梯斯”号、“皇后”号为先导，风帆动力的各战舰和部份运输船随从其后。“布朗底”号、“都鲁壹”号和“摩底士底”号冒着厦门岛南岸等处清军的炮火，一面开进，一面还击，直趋鼓浪屿，与鼓浪屿清军炮台展开了激烈的炮战。“威厘士厘”号和“伯兰汉”号这两艘载炮各达72门的军舰，跟随“班廷克”号指示的水道，于下午2点半在清军最主要的防御阵地——石壁正面距岸约400码处抛锚定位，与先期到达的轮船“西索斯梯斯”号和“皇后”号，一起同石壁清军进行炮战。战舰“巡洋”号，“卑拉底士”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继续跟进，在厦门岛南岸石壁东端处下锚，与石壁及石壁以东的清军炮台进行炮战。此时，厦门岛南岸和鼓浪屿完全沉浸在炮火的销烟之中。由于双方在火炮性能、弹药质量、射击技术等方面的差距，清军在炮战中处于劣势。

下午3时左右，“布朗底”号等3舰在进行了80分钟的炮击后，打哑了鼓浪屿岛上的清军3座炮台，英军海军陆战人员即在该岛最东处炮台的右翼沙滩登陆，其它步、炮分队亦随后登陆。登陆英军攀越山岩和其它障碍，从清军炮台的侧后发起进攻。守台清军以鸟枪、长矛以至石块进行抵抗，终不支。英军很快驱散鼓浪屿各炮台的守军，占领鼓浪屿岛。在鼓浪屿的炮战结束之后，英舰“摩底士底”号、“布朗底”号起锚，溯流而上，强行突入厦门西水道（即内港），打哑沿途清军各炮兵阵地，俘获该处停泊的已经基本完工的26艘清军战船，上有128门大炮。

下午3时45分，轮船“复仇神”号、“弗莱吉森”号拖带一些小

^①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132页。

船,载运第18团、第49团,航至厦门岛南岸。在“巡洋”号等4艘军舰的炮火掩护下,英陆军在石壁东侧的沙滩上登陆。随同行动的英陆军司令郭富下令,第18团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占据石壁之后的高地,由上而下地攻击石壁守军;第49团沿海岸攻击前进直插石壁,从临海的炮洞、墙垛处攻入壁。英军遂成钳形攻势向西进扑。第18团迅速攻开石壁侧后的一座门,蜂拥而入,守壁清军见势大部溃逃,部份将士与之肉搏。正在石壁正面进行炮战的“威厘士厘”号等舰的水兵,亦登陆配合作战。金门镇总兵江继芸见势不可挽回,走出阵地,跳海自杀。约4时,石壁失守,厦门岛南岸的炮台等阵地随之亦陷。

登陆英军在占据厦门岛南岸防御工事后,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其目标是厦门城^①。各处清军多次与之交战,均被击溃。颜伯焘见此局势,从战前的高度自信转变为极度恐惧,率领文武官员逃往同安县城。岛上清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纷纷溃逃。英军在占领厦门城东北的高地后,因天色已晚,便停止进攻。

8月27日清晨,英军攻击厦门城,当攻至城墙时,发现守军已于夜间撤走,遂顺利占领该城。此后,英军又派兵搜索全岛。

此战,清军亡总兵1名,副将1名,守备等军官6名。兵丁的伤亡缺乏准确的数字。据后来调查该战的清方官员称:厦门岛南岸各阵地战死兵丁40余名,鼓浪屿岛战死兵丁33名,受伤37名。但从清方官员奏折中的战前派防、战后回营的数字相比较,厦门清军共计减员324名。英方的报告称,英军在此战中共战死1名,受伤16名。

英军的目的并不是长期占领厦门岛,而是通过不断地打击清军,造成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屈服。为此,他们放弃了厦门岛,留下军舰3艘、运输船3艘、陆军550人,驻守鼓浪屿岛,主力继续北

① 当时的厦门城与今厦门市不同,仅是一个位于厦门岛西南部的周长2公里的圆型城堡,驻以水师提督衙门,又称“石寨”。

犯浙江,扩大侵略战争。颜伯焘在英军撤走之后,派兵重新占领厦门。但他惊魂未定,对一水之隔的驻守鼓浪屿的英军,一直不敢采取任何行动。1842年2月,怡良继颜伯焘为闽浙总督。他不顾道光帝的一再严令,不仅拒不攻击鼓浪屿清军,而且进一步地严令下属避免与英军发生冲突,“宜饬坚守,勿令挑衅;脱有贪功名心,则夷必撤浙省之兵船来与我抗,是我为浙受祸也。”^①很显然,他害怕再次战败而不保官禄,不惜与狼伴处,而损害各地抗战的形势。鸦片战争结束后,鼓浪屿仍是英军手中的抵押物,直至1845年3月,清政府付清绝大部分战争赔款,英军才撤离鼓浪屿岛。

五、战败原因分析

由于第一、第二次厦门之战并非为真正意义上的攻防战斗,其经验教训并无典型的意义,笔者在这里集中就第三次战斗,作一些分析。

关于第三次厦门之战的失败原因,当时的论者就有一些分析。《道光洋艘征抚记》认为战败原因有三:一、颜伯焘放弃了邓廷桢的集中兵力专守厦门岛南岸的战法,以为守不如攻,准备造舰“出洋驰逐”,从而放松了对厦门岛本身的防御;二、他在外围岛链的设防,“备多力分”,分散了兵力;三、他在临战前“尽撤水勇八千”,使得“内备单弱”。《夷氛闻纪》亦有相类似的评论。《中西纪事》更是指责颜伯焘“无先事之备”,“为粤东议抚事所误”而造成此战的失败。这些论点在当时的影响较大,且又多为今人所引用。

笔者以为,上述论点似不能成立。从本文第三节中可以看出,颜伯焘的战法,正是继承了邓廷桢的思想,即据守沿海坚强防御据点,抵抗英军舰船的进攻。他在厦门岛南水道尤其是厦门岛南岸的布防,远远超过了邓廷桢的筹防措施。颜伯焘在奏章中也确实提到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第60页。

过“近海接战”^①，但此仅指外围岛链，并且是在完成了厦门岛南岸、鼓浪屿、海澄县之屿仔尾三处主阵地的建设之后，为扩大防御的层次和范围，进一步改善防御态势，而在该处修建炮台、建造大型舰船的。他的这一计划，后来并未成功，但并没有影响或削弱厦门南水道的防御力量，似不能因此而称颜伯焘将战法改为“出洋驰逐”。从他布防的区域来看，也均属要冲，正是英军重点进攻的地区，似不能称之为“备多力分”。他所遣散的水勇，是奉旨而不得不为之，更何况这些未经正规训练的准军事力量，其主要职责本是各保清军未重点设防的地区，既使不撤，在后来的战斗中也不可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英军并未攻击由水勇等协防的地区。至于《中西纪事》中提出颜伯焘战前未作充分准备，被奕山的谎报（“粤东议抚”）所迷惑，则与当时的事实完全相反。由于资料的限制、视野的狭窄和认识的偏误，使当时的论者未能作出合乎真实的结论。

今日的一些论者，又称第三次厦门之战的失败，是由于清政府内部投降势力占了上风，实行妥协政策所致。笔者以为，此说似不合史实。道光帝此时仅仅是为奕山的谎报所迷惑，根本没有妥协之意。颜伯焘更是以倡言起用林则徐、对英决战而闻名，并在战前弹劾奕山、要求加强备战。实际上，自琦善被逮问之后，清王朝内部已无议抚的声言，连败将奕山、杨芳等人为保住官爵，宁可谎报军情，也不敢说明真相而奏请议和。颜伯焘本人也只是在战败之后，才改变其先前的主战态度的。

第三次厦门之战的失败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两项：

一、火炮技术落后。第三次战斗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的对战。双方的火炮性能、弹药质量、射击技术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34页。需说明的是，当时的“近海”之概念，与今不同，大抵相当于今之沿海，而今之近海，当时称“大洋”。

等因素,笔者曾撰文说明^①,此处可不重复。可以再引征的,是当时人对于炮车的论述:

炮车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颜伯焘)惜费,不造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可以灭贼,何须再装药也。及逆船至,兵士见其帆影已将炮放完。英逆炮在船两旁,每边计四十门,衔尾二船齐进,至我炮墙边,开炮四十声,拽船而去,后船如之;前船复回,又连四十炮。不转瞬间,而沿海炮墙齐塌,军士大溃,制军亦奔,衣物并失,仅以身免。^②

这条材料所叙述的是清军石壁阵地与英舰“威厘士厘”号和“伯兰汉”号的交战情况。由于炮车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为清军石壁安设的重炮配置传统样式的炮车是否有效,此处可不具体讨论,但清军火炮在战斗中为何未奏效果却在这条材料中有着明确的说明。再引一条材料看石壁阵地的炮洞情况:“台墙开门置炮,墙厚门深,又不能左右活转,但可直击”^③。火炮不能左右侧击,就大大限制了射击范围。在第三次厦门之战中,由于清方火炮的种种弊陋,其南水道部署的几百门大炮,并未显示其威力。颜伯焘奏折中称击沉英轮船1艘、兵船5艘,全系谎报,而清方的损失却很大。据战后勘查,厦门岛南岸的“石壁及炮台,多有击坏情形”^④。时任汀漳龙道而在厦门后方的漳州一带负责防务的徐继畲,对此有很深体会,谓:

我之铁炮,不如彼之铜炮轻灵,我岸上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稠密。相持半日,大炮台被其攻破,遂致全军溃

① 见拙文《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③ 梁廷楠:《夷氛闻纪》,第83页。

④ 瑞华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568页。

败。^①

二、轻视英军陆战能力，无防敌登陆措施。第三次厦门之战的第二阶段，是登陆英军与守台清军的陆战。鸦片战争初，清朝上下咸论英军“船坚炮利”，善于海战，但又普遍认为英军不善陆战，一旦登岸即非清军之对手，甚至还称英军“结束严密，一仆不能起”。颜伯焘也不例外。第一、第二次厦门之战中，英军仅是以船炮作战，更加强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因此，为了防御英军的利炮，颜伯焘非常重视厦门各工事的防炮能力，如最重要的工事——石壁，战后英军军官亦称赞其坚固程度：“即使大船放炮至世界的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上的伤害”^②。但是，颜伯焘对登陆英军却没有设置相应的防御工事和手段，也没有足够的专门与英军登陆部队交战的清军部队。尽管他在厦门岛的东、北两个方向布兵，但其所防者并非为登岸英军，而是汉奸。他称：在沙角战斗中“有汉奸登岸，万一心生厦岛，诚恐故智复萌”^③。颜伯焘等人的这种无知，致使清军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分寸大乱，全无战法。据守石壁、炮台等处的清军本是用岸炮与英舰船对敌的，遇到登陆英军，只有少数兵弁用鸟枪等简陋兵器进行效力不大的抵抗，大部因战前毫无准备而见敌辄奔。坚固的阵地——石壁不是在其正面被英军的舰炮打垮的，而是在其防卫力极差的侧后被登陆英军攻破的。在第三次厦门之战中，登陆英军似乎比其舰船还要幸运，并未遇到强劲的抵抗。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收到颜伯焘关于厦门战败的奏折，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他通告沿海各省疆臣，“从来议者，皆谓该夷习惯水战，若诱之登陆，便无能为。故人人意中以为只须于海口严防，毋庸计及陆路交战。今福建厦门之役，该夷竟

① 徐志畬函，《鸦片战争在闽台资料选编》，第148页。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58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80页。

有伪称陆路提督名目，是逆夷助恶工具，百计环生”，下令各地也要注重陆上的防守。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道光帝直至此时方得出此种认识，虽说为时已晚，仍不失为亡羊补牢之计。但是，道光帝对此还是将信将疑，居然昏言英军的“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募闽、广汉奸，为其登陆交战之计。”^① 君臣无知至如此田地，战事又焉得不败。

相对于清军而言，第三次厦门之战中英军的战术也使用得颇为有效。英军针对清军炮台工事环立，陆上防御能力差的特点，以舰炮轰击清军工事的正面，吸引守军，掩护陆军从炮台等工事的侧翼登陆；登陆英军又注重抢占制高点，从清军各工事防护力最弱的侧后发起进攻。这些战术，使英军能够相当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长处，攻击清军的短处，因而相对其战果而言，伤亡极小。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不去计较第三次厦门之战失败的具体原因，而将从1840年7月至1841年8月的三次厦门之战进行通盘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厦门清军尽管已经腐败，但在战争期间还是有了某种程度的振作，主持厦门防务的清朝官员都不是主张妥协的人士，而都有过用军事手段战胜英“夷”的决心和信心。从平时体制到战时状态，从疏于防御到严密布防，清朝官员和清军将士都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然而，他们的这一番努力，仍未能使他们免于失败的境地。三次厦门之战的历史过程提示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腐败因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清军只是一支中古式的武装力量，厦门防务的加强也只是最大可能地运用各种传统防御手段。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厦门加强防御的进程，只看作是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质量的变换的过程。在战争中，质量更常常起到主要的作用。一支传统的清军用传统的方式，是不能战胜近代化的英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次厦门之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1161至1162页。

战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清军将士对于近代化战争的无知,在于清军的战术和技术均已落后于时代。这也正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一败再败的最基本的原因。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茅海建,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